

艺术观察

# “其命维新”永流芳

## ——三地举办纪念傅抱石诞辰120周年研讨活动观察

□ 陈米欧

11月4日下午,“傅抱石:二十世纪山水画的巅峰”特展座谈会在江苏省国画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傅抱石研究专家、学者、书画名家等,围绕傅抱石的艺术成就、社会影响、历史意义等议题分享研究成果。

11月5日,“傅抱石的新时代意义”研讨会在江西新余学院召开,来自省内外的30余名知名艺术家、学者,从不同视角畅谈对傅抱石艺术的理解。

11月7日,作为傅抱石学习和工作过的母校豫章师范学院,以“江山多娇”为主题举办纪念傅抱石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江苏、陕西、广东等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傅抱石艺术各抒己见,并致敬这位艺术巨匠。

几乎是连着三天,江苏、江西两省三地先后举办傅抱石学术研讨活动,彰显三地对傅抱石诞辰120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的高度重视。通过这些研讨会的发言不难发现,傅抱石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后人的敬仰中,在专家学者的研讨中,总能常学常新。综合三地研讨会发言及与部分美术界人士的交流,有以下观点或话题值得关注。

傅抱石一枚自刻印章“其命维新”,是他艺术上坚持创新最有力的表白。其命维新,也是诸多专家对傅抱石一致称赞并能屡屡谈出新意的一方面。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于量以《政治叙事与民众情感:傅抱石文化符号的双重性》为题,剖析了傅抱石描绘新中国新风貌题材主题性创作的典型特征与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自然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促使傅抱石以及以他为代表的金陵画派在艺术上进行了大量革新,包括图像内容、创作方式以及图像传播路径上的创新等。

北京画院理论部研究员马明宸是资深的新金陵画派研究学者,他从艺术创作实践的角度梳理了傅抱石的创作生涯,认为傅抱石对山水画的变革主要在于语言形式层面、意境转换与笔墨形式层面。

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楚小庆认为,傅抱石的艺术地位及时代意义都是伴随其作品的艺术高度和历史性突破而产生的,“傅抱石自身所反映的品质就是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勇于改旧弊、不惧新挑战的民族精神特征”。

在绘画技法这一具体层面,傅抱石有“抱石皴”等技法创新,这也是专家学者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江苏省国画院画家、傅抱石纪念馆原馆长徐善认为,傅抱石作画并不讲究特殊技法,他最大的成就在于把“散锋笔法”发挥到极致,猛刷猛扫,气吞山河……在他的雨景画中就能充分体会到这一点。

马明宸说,傅抱石将写生元素自然融进自己的创作,其次是皴法与色法的结合十分自然和绵密,再则空间层次的表现是其非常重要的特色。

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虎啸认为,傅抱石等大家在中国画发展中全力把中国画向前推动。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正是

将自己的笔墨语言发挥到极致,解决了很多中国山水画无法解决的师造化、中国画如何往前走的问题。

随着新的研究史料不断被发现,有关傅抱石的研究也呈现出新的视角和观点。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日本东京大学艺术史博士后研究员郑子路,基于其《傅抱石与金原省吾: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馆藏资料考略》论文的研究基础,展示了在武藏野美术大学见到的馆藏傅抱石书画、金原省吾日记,以及与傅抱石相关的书信原件、书籍等珍贵文献资料。他表示,这些资料的文献价值很高,有助于促成其与研究者共享的研究工作,如金原省吾日记中涉及傅抱石的内容多达百余处,集中在1934年、1935年和1936年,比较全面地再现了傅抱石与金原省吾的交往过程。

南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陈露副教授认为,傅抱石在1933年至1937年赴日留学与南京执教期间,每年都要回南昌,频率之高,可见其乡情之深。傅抱石能够留学深造,更离不开青年时期如左莲青、王易、朱念祖、彭醇士等名人以及新余樟塘村父老的培养与扶持。可以说,青年傅抱石的横空出世,正是来自于江西文人群体的有力擎托和江西历史文化底蕴的浸润。傅抱石也在江西积淀起深厚的传统艺术修养,并激励自己走上推陈出新之路。在我们探讨傅抱石艺术的传承与弘扬时,也不应忽略他对江西艺术的传承与弘扬。

“一名艺术家,特别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艺术家,从他的出生地、年龄、阅历以及他遇到了什么人、帮助了他什么,这

在书本上是难以见到的。傅抱石在南昌成长过程中的相关研究特别值得重视。”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罗坚认为,南昌市于2021年主办的“家园雨露——傅抱石南昌朋友圈翰墨遗存研究展”是一个好的开始,相关研究还应继续深入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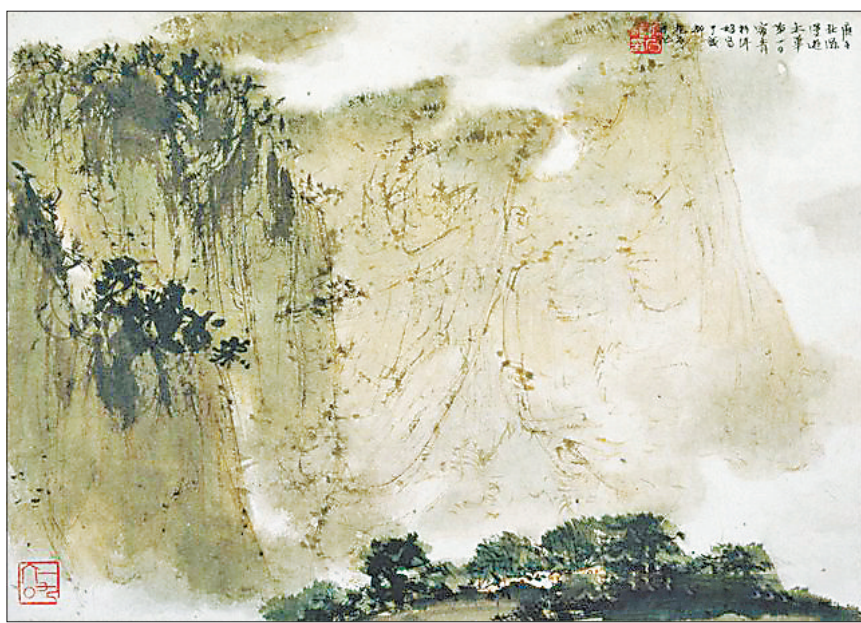
有专家指出,傅抱石一生刻印约3000方,跟其绘画作品的数量相当,因此从印章角度展开对傅抱石的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根据最新史料显示,傅抱石在重庆生活工作之后,刻印大大减少。他给一名藏家的回信中提及“入川后,非好友绝不提刀”。这一史料说明,傅抱石一生

多数印章是在南昌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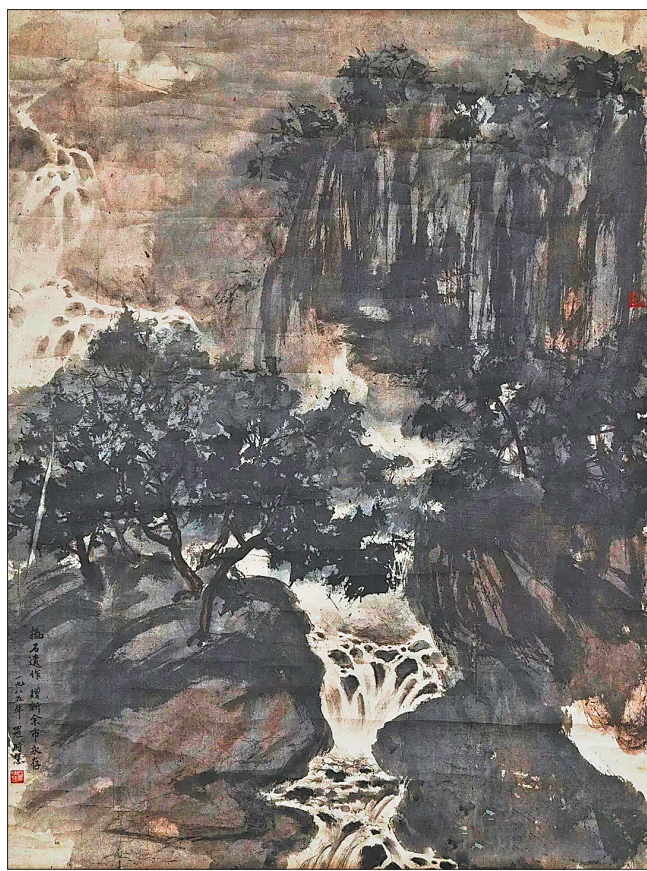
此外,研讨会还有一个小插曲,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最具创造性的美术家,傅抱石出生在南昌是一个清晰的事实,但有的省外媒体记者却不知晓,报道称傅抱石“出生在新余”。

新余是傅抱石的祖籍地,南昌是其出生地,南京则是他的定居地,三地共同见证了傅抱石成为百年艺术巨匠的辉煌一生。正如新余市博物馆馆长高增忠所言,傅抱石是民族文化的坚守者、爱国精神的践行者、人格魅力的塑造者。其命维新,永世流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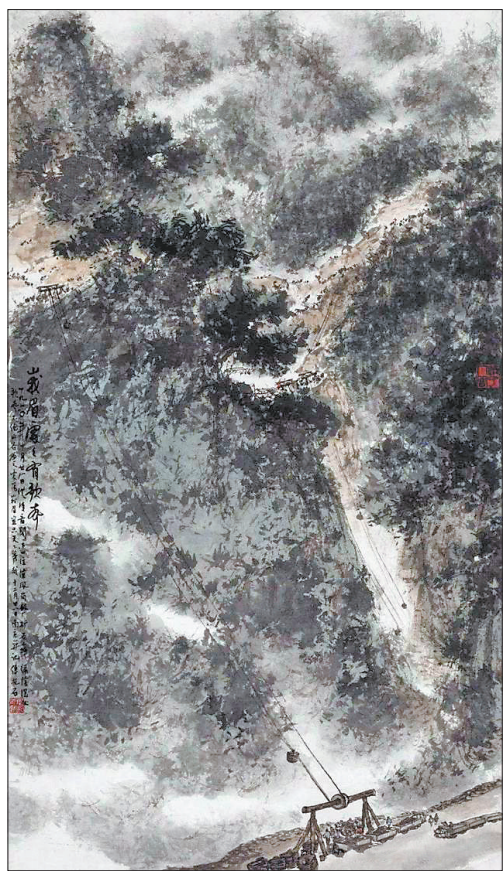
(配图均为傅抱石作品)



《漫游太华》(南京市“傅抱石:二十世纪山水画的巅峰”特展展品,南京博物院藏)



《雨后奔泉图》(新余市“画笔壮山河——纪念傅抱石诞辰120周年展”展品)



《峨眉处处有歌声》(南京市“傅抱石:二十世纪山水画的巅峰”特展展品,江苏省国画院藏)

收藏一线

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



图1:《遵义会议三十周年》纪念邮票之“娄山关大捷”

# 品邮票 话长征

□ 胡胜盼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让我们在欣赏历年来发行的长征题材邮票中,重温革命先辈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是长征途中一次挽救党和红军命运的重要会议。1965年1月31日,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30周年,中国邮政部门发行了《遵义会议三十周年》纪念邮票,其中第三枚为“娄山关大捷”(图1)。娄山关大捷是遵义会议召开后,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邮票画面中,娄山万峰插天,苍山如海,夕阳如血,红军战士急速前进,毛泽东同志站在高地凝视远方。



图2:《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邮票之“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1985年1月15日,邮政部门发行了《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图案分别为“遵义会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图2)。“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图案取自画家赵域创作的同题油画作品。



图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纪念邮票之“三军大会师”

1996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其中“三军大会师”(图3),是根据油画家蔡亮、张同凝夫妇共同创作的油画作品设计而成的。三军大会师是指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这也宣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结束。



图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邮票小型张

200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邮票发行,含4枚邮票和1枚小型张邮票(图4)。4枚纪念邮票图案分别以油画家靳尚谊、彭彬、刘国枢、张文源的油画《送别》《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过草地》为主题,小型张则以国画家李宝林、周顺恺的国画《大会师》为主题。这套邮票的特别之处,是依据长征征途地点顺序设计的。



图5:《遵义会议八十周年》纪念邮票之“遵义会议”

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2015年1月15日,中国邮政在遵义会议旧址发行了《遵义会议八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图案分别为“遵义会议旧址”“遵义会议”(图5)。



图6:《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票之“四渡赤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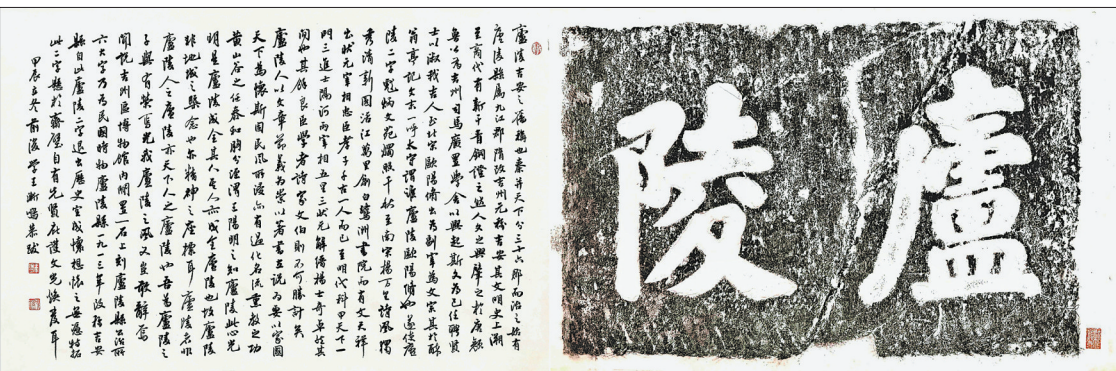
2016年10月22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6枚。该套邮票由画家沈尧伊设计。作者以其对长征特别的情感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邮票图案分别为“长征出发”“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图6)“过雪山草地”“胜利会师”“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

1936年10月22日,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的光辉乐章。

文人雅事

# “庐陵”拓碑记

□ 王渐鸣



“庐陵”拓片及作者自跋

吉安,古称庐陵。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自谓“庐陵欧阳修”,用的是故乡的古称。正因为他这一呼,遂令“庐陵”二字震烁文坛,使吉安后学们无不喜欢称籍贯为“庐陵”。文天祥有诗“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更让“庐陵”有了不容玷污的神圣感。

笔者近来发掘整理吉安历代先贤的书画作品时发现一个独特现象,很多吉安人在落款时也喜欢沿用“庐陵”古称,如南宋杨万里,明代解缙、杨士奇等。还有一些吉安人,父辈之前早已落籍他乡,却仍以庐陵人自居,突出的代表人物有欧阳玄、杨文懿、周炼霞。欧阳玄的曾祖父已迁居到湖南浏阳,但他仍然署“庐陵欧阳玄”;杨文懿的先人杨德“以功授千户,征蜀著功,调守黔”,落籍贵州,但他喜欢自署“吉州杨文懿”;周炼霞的

父亲任侯补长沙知府,她出生于湖南,12岁时便移居上海,但她的画作上仍署“吉安周炼霞”。庐陵,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更像是一个精神坐标或文化图腾,沁入他们的血液和生命之中。

历经岁月的变迁,吉安大地上很难找到有关“庐陵”的文化遗痕。今年早春有朋友告知,在吉州区博物馆内草地上闲置有一块刻有“庐陵”字样的横条石匾。这正是古老“庐陵”的物证。近日,笔者携子唤友一起将此古石拓下来,并心想跋段小文,以作瞻仰自勉。

唐文治先生说过:“爱国不在空言,当先爱乡。爱乡不在空言,当先爱乡先哲。爱乡先哲不在形迹,而在精神。”庐陵“文章节义、忠正刚烈”的精神特质,永远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和立身守则。望着这两个字,仿佛有

无数庐陵先贤也在望着我们,目光、雪光、吉祥光,光照千古;剑气、文气、浩然气,气贯长虹。某日,当气蕴于胸,稿成于腹,研墨拈笔,欣然题跋如下:

庐陵,吉安之旧称也。秦并天下,分三十六郡而治之,始有庐陵县,属九江郡。隋改吉州,元称吉安。其文明史,上溯至商代,有新干青铜证之。然人文之兴,肇之于唐。颜鲁公为吉州司马,广置学舍,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聘贤士以淑我吉人。至北宋,欧阳修出,为副宰,为文宗,其于《醉翁亭记》文末一呼“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遂使“庐陵”二字彪炳文苑,烛照千秋。至南宋,杨万里诗风独秀,清新圆活;江万里创白鹭洲书院,而有文天祥出,状元宰相,忠臣孝子,千古一人而已。至明代,科甲天下,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解缙、杨士奇卓然其间也。其余良臣学者、诗家文伯则不可胜计矣!

庐陵人以文章节义为荣,以著书立说为要,以家国天下为怀,斯固民风所浸,亦有过化名流熏染之功。黄山谷之任泰和,胸分泾渭;王阳明之知庐陵,此心光明。是庐陵成全其人,其人亦成全庐陵也。故庐陵,非地域之概念也,亦精神之坐标耳。庐陵者,非庐陵人之庐陵,亦天下人之庐陵也。吾为庐陵之子,与有荣焉;光我庐陵之风,岂敢辞焉?!

闻说吉州区博物馆内闲置一石,上刻“庐陵县公治所”六大字,乃为民国时物。庐陵县一九一三年改称吉安,自此“庐陵”二字退出历史,空成怀想。怀之无凭,特拓此二字悬于斋壁,自有先贤庇护,文光焕发耳!